

19 21 24

## 转型时期相对过剩假说

祝志勇<sup>1</sup> 刘斌<sup>2</sup>

F124.7 F126

(1.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 重庆 4000715; 2.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成都 610074)

**摘要** 目前“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没有内生组织和技术创新机制,微观主体行为低效率,传统体制集中决策控制的刚性作用,促成高投入替代低效率,形成大量无效供给并累积;另一方面,我国二元结构强度再增生,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迟缓,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弱化,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关联水平和质量下降,经济增长缺乏结构效应,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现状。“过剩经济”是果,低效率、低收入是因,故称“相对过剩”。

**关键词** 转型时期 低效率 低收入 相对过剩(假说) 中国, 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4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0)01-0031-04

## A Transitional Period on Relative Surplus' Hypothesis

ZHU Zhi-yong<sup>1</sup> LIU Bin<sup>2</sup>

(1. Economic College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Economic Department of Southwest Financi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basic reasons for “buyer’s market” or “surplus economic” are both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micro-base of macro-economic working can’t grow in interior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thus, micro-behavior is low-efficiency. in addition, traditional concentration-decision contributes to high-input replacing low-efficiency, resulting in a number of fruitless suppl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double-economic coefficient enlarging, peasantry’s income increase slowly, it weakens effect on supply and demand. Economic growth is lack of structure effect.

**Key Words** a transitional period low-efficiency low-income relative surplus

我国目前人均 GDP 约 750 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仅越过温饱,却出现了“消费无热点”的尴尬局面。用传统经济学资本——劳动力分配关系的失衡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下降到影响国家调控能力的地步,1996 年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为 10.8%,中央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为 4.9%;国有工业企业 1996 年开始出现净亏损,净亏损额度达 400 多亿元,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率率仅 7.11%;全国居民储蓄余额达 5 万亿元,人均居民储蓄余额 4000 多元。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难以解释由“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剩。因为我们的市场制度正处于培育和确立过程,不存在既定市场制度条件下的“市场失灵”问

题。与“消费投资无热点”不协调的是:无效供给能力不是“核销掉”,而是累积;有能力让亏损企业继续存在,而无能力转产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家电业开工能力不足 50%,而没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的农户分别为 1.6、1.62、1.4 亿户,城镇居民家电到期更换率超过 3%;全国有 5000 万城镇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不足 4 平方米,而 1997 年商品房积压闲置达 7000 多万平方米。认识这种非均衡现象,“只有先了解中国,才能对中国经济做出符合实际的说明”。

### 一、低效率型的相对过剩

80 年代中后期,有学者把低效率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联系起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短缺时,强调供给分析方法,认为“效率问题,不只是一个

收稿日期:1999-05-28

作者简介:祝志勇(1965-),男,四川蓬安人,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第十卷第 1 期

微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决定一系列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主要因素”。低效率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结构转型时期经济的最基本特征,过剩是果,低效率是因。

### (一) 低效率与供给缺口

企业(劳动者)行为低效率主要是体制原因。集权经济体制严重缺乏激励机制,存在劳动与贡献不一致和社会成员(企业和劳动者)不能自由退出的障碍,社会成员的组织和技术创新成本非常高,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及结构控制在行政科层组织手中。多劳不能多得,勤劳不能致富,无疑鼓励人们偷懒,出工不出力,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名义劳动大于实际劳动;劳动者没有择业和迁徙的自由就不能“人尽其才”。集权经济体制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劳动者供给劳动行为存在劳动缺口,导致效率缺口和供给缺口(图1)。

图1中,横轴表示总供给或产量水平,纵轴表示资源利用效率或生产率水平,垂线D表示给定的产品需求水平,向各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 $S=S(E)$ 表示既定资源数量下对应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产量水平或供给水平, $E_2, Q_2$ 分别表示达到供求均衡时的生产率水平和产量水平, $E_1, Q_1$ 分别表示实际生产率水平和实际产量水平。 $Q_2Q_1$ 为供给缺口, $E_2E_1$ 为生产率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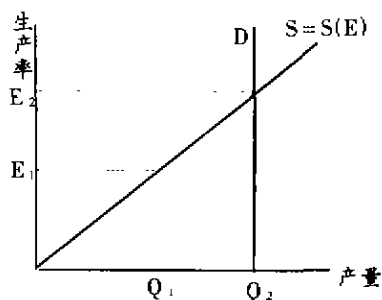


图1 简单的短缺供给决定模型

### (二) 低效率与高增长

集权经济体制存在微观主体供给行为的低效率引致总供给(总产出)增长水平难以下降的机制。集权经济体制有高增长目标偏好,一方面与工业赶超战略有关;另一方面集中决策和直接控制发生在行政科层组织上下级间,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为了各自利益在不断博弈和互动中放大经济增长目标。上级组织有“加官进级”的引诱,同时用高指标督促下级及附属企业“尽力工作”。下级组织常在供给能力

方面“打埋伏”以“跑步前进”满足上级组织增长目标偏好。如果上级组织增长目标偏低,就无法控制下级组织及企业的“尽力工作”,将导致更大的劳动缺口,总供给漏出也会更大,集权经济体制监督成本昂贵,采用高增长目标是增进经济效益,增加总供给的次优选择。低效率制度安排下,高增长率是对低效率损失的替代(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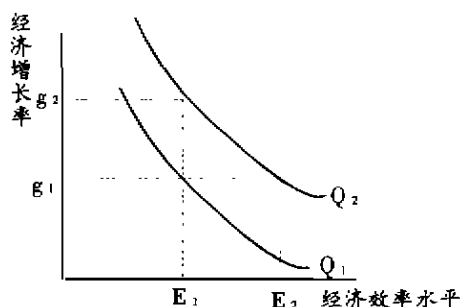


图2 高增长低效率的替代模型

图2中,横轴表示经济效率水平,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Q_1, Q_2$ 表示相应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率水平的等产量曲线, $E_2E_1$ 表示体制低效率对效率水平的损失,经济活动的实际效率只有 $QE_1, g_1$ 对应的等产量曲线为 $Q_1$ ,为达到较高产量水平 $Q_2$ ,只有提高经济增长 $g_1, g_2$ 。

高增长率对低效率损失的代替,必然导致社会总供求失衡,要么短缺,要么过剩。经济增长率提高到 $g_2$ ,投入品增加量为 $(Q_1/E_1)-(Q_2/E_2)$ 。如果沿着多马模型的思路,不仅考虑投资需求效应,也考虑投资供给效应,就容易理解短缺和过剩。出现过剩情况:增加的投资量使潜在产出规模增加,反过来对投资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投资规模受整个社会储蓄规模边界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意愿的制约,只要投资增长率下降,累积增加的潜在供给规模就会“浮出水面”。供给方由于既得利益刚性的作用,供给与需求水平并无下降,造成供大于求。

### (三) 低效率与无效供给累积

出现相对过剩,并不意味着告别了短缺,进入买方市场,而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尚未根本建立,低效率供给长期累积的显性化。改革2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对外开放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及内外融资水平等都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但经济低效率这一最基本特征依然存在,1979—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

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57%、26%、17%；1992—1996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 12.7%、51.6%、35.7%。尽管国有经济占 GDP 的份额不足 40%，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小，但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达 60% 以上，分布在 600 多个行业，银行信贷资金 80% 流向国有企业。从制度安排角度看，非国有经济还没能替代国有经济，其中低成本——高技术在位的非国有经济替代高成本——低技术在位的国有经济明显，低成本——低技术在位的非国有经济与高成本——高技术在位的国有经济处于僵持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向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推进和深入，但股份制的内在机理却简化为筹资手段，内部治理结构中经济权力结构、角色分工成为原企业书记、厂长等的对号入座等等。这并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有错，而是传统制度安排的刚性使不够完善的新制度安排“失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不少国有制企业变成厂长所有制企业，企业内部的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销售主管三套马车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和亲信手中，大肆敛财，“穷庙富方丈”。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向个人腰包，而且极大伤害了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有可能使创新主体（集团）减少。广大职工利益受到侵犯，劳动创新供给行为的缺口会更大，加剧了企业行为效率下滑势头。

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尚未建立，与之相应的宏观调控也显得力不从心；企业行为的低效率在“条块”间生成大量无效供给。一方面“条块”对高增长的偏好依旧，继续重复、盲目投资；另一方面，“条块”着眼于各自既得利益，产业整合能力差，缺乏“吐故纳新”、“取长补短”的机制，使无效供给累积。

## 二、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多数在农村，如没有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保证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不仅会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阻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且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耦合度，阻碍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最终使产业结构不能发挥成长效应，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国家计委研究所一份报告表明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二元经济结构度，1978 年中国达到 6.08，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1978—1984 年农业超常规发展，1984 年下降为 3.58，1985—1988 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88 年上升到

3.89，之后农业增长迟缓，1994 年上升到 4.14；日本工业化初期（1955 年）为 2.94，台湾地区（1965 年）为 2.3。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再增生，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严重错位，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广大农民收入增长趋于停滞，是目前相对过剩的另一主要原因。

### （一）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

1979—1984 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产生供给效应。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实行“缴足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劳动贡献与所得相称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的变化，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名义劳动与实际劳动相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收入分配增加的供给效应明显。农产品供给大大增加，1984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073 亿吨，1978—1984 年，我国农业生产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 55.4%，年均增长 7.6%；1981—1984 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15.3%。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 1978 年为 0.45:3.71 到 1984 年为 0.4:2.6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0.2% 下降到 1984 年的 64.2%。这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消费品供给，为轻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资金，改善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同时，为乡镇农业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经济环境。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不仅产生供给效应，而且产生需求效应。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品占全社会消费品比重由 1978 年的 40.8% 提高到 1984 年的 52.5%，对轻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拉动力，轻工业 1978—1984 年年均增长 11.7%。轻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由 1978 年的 43.1% 上升到 1984 年的 47.4%，使重工业摆脱长期自我循环局面，国民经济结构耦合度提高。研究表明：1978 年以前，中国重工业产值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密切相关（ $r=0.9254$ ），与轻工业增长的相关性弱（ $r=0.678$ ）；轻工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程度也较高（ $r=0.7214$ ），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却不存在相关性（ $r=0.2768$ ）。1978 年始到 80 年代，轻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消失，与社会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呈高度相关性（ $r=0.8496$ ）。

### （二）农民收入增长迟缓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

1985—1988 年，农业陷入“一年减产，三年徘徊”

境地,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只占1979—1984年的54%,年均增长率为4.1%;农业经济个人纯收入实际增长率2.9%,农民家庭平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为1.09%,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72上升到2.05,农民储蓄占城市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比重由34.8%下降到30.0%;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总产值占轻工业产值比重由68.7%下降到65.0%。加之工业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工农产品比价回归,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加速了农业内部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影响,1988年引起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是粮价上涨。90年代,农业产值增加较快,1991—1996年,年均增长率7.8%,粮食产量1995年达到46662万吨,但增产难以增收,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1.72扩大到1990年的2.02、1995年2.47,城乡基尼系数由1990年的0.37扩大到1995年的0.434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区间(0.3—0.4);第二与第一产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由1985年的4.54上升到1996年的5.20;1996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20.0%、50.5%,由此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度继续上升。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弱化,使产业结构供给的需求弹性减小,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1985、1990、1995年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76.3%、73.6%、71.0%,而农村销售商品占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分别为53.0%、48.5%、39.9%。1990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571元,扣除物价因素,仅相当于1984年的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1985年的2.3扩大到1990年的3.0、1996年的3.2。工业总产值1986—1996年年均增长率为17.5%。但工业总产值增长受广大农民最终消费需求拉动力较小。

1985—1988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7.8%,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47.1%上升到49.3%。轻工业比重的上升,较大程度由城市居民

消费结构的变化所推动,加之对技术引进缺乏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移入结构”与原有产业的关联度小。耐用消费品工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过饱和,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新一代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同时在1988年达到峰值。当满足了全国超过20%人口的城市消费群需求后,农村庞大消费群空位。家电工业设施利用率下降,开工不足持续整个90年代。

1991年轻工业产值比重开始下降、重工业产值比重上升,重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主要由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大投入所驱动,原材料工业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和总资产比重1995年分别比1990年上升3.9和3.4个百分点;原材料工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3年为35.6%,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日本1953年为32.0%,韩国1997年为29.1%,巴西1974年为34.5%。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高投入率和增长率抬升了重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并不代表工业化进程呈现重工业化趋势;对推动重工业化十分关键的机电工业供给不足,1995年机电产业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仅22.4%,比日本1965年的机电产业化比重还低2.8个百分点,致使投资品供给产业关联规模不能深化,关联耦合度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得不到机电工业支撑,原料工业供给增加,满足了一般加工工业数量扩张对高物耗的要求,导致低水平的一般加工工业供给能力过剩。

#### 参考文献

- [1] 厉以宁.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20.
- [2] 胡汝银. 低效率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14, 13, 40, 163 - 188.
- [3] 周振华. 增长转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21.